

著名中医张仲梁先生传略

张晓初*

我父亲张仲梁生于1905年7月，卒于1971年6月，字祖栋，系著名中医。江苏省江宁县禄口乡上马塘村人。上马塘村是一个山清水秀、风景宜人的乡村。父亲就生在这儿的的一个中医世家里，传到父亲已是第七代了。父亲排行老二，自幼跟随祖父倬云过着边耕种、边习医的生活。祖父在禄口镇开设了一爿叫“寿春堂”的小药铺，自己坐堂行医，专治儿科诸病，在乡里颇有信誉。父亲跟随襄理诊务，深得庭训，受到良好的医学家传。在这同时，父亲还向前清老秀才、江宁名儒江守权学习古文和书法。祖父倬云又将祖传的“痧痘秘诀”一书传于父亲，为父亲在以后中医儿科学术上的成就奠定了基础。

当时在茅山上有一座道观，内有一位宋老道长，年逾百岁，为人古朴、脱俗、气宇轩昂，精通医学，内、外、妇科尤为专长，并擅长针灸、气功等医术。周围百里慕名上山求医者众多，声名远扬。因祖父平素信仰佛、道二教，故宋老道长常来禄口与其交往，顺便买些药材回茅山。这样相处一久，彼此更为熟悉友好。祖父便请道长收仲梁为徒，学习医道。宋老道长再三推辞，经祖父苦苦相求，宋老道方才应允，并对我父亲说，跟我学徒要能吃苦耐劳，为人正直才

行。父亲一一答应，遂跟随上山。

第一年在观里做些杂活，上山砍柴、割草、挑水，打扫卫生，烧茶煮饭，样样都干。道长看到我父亲不怕苦不怕累，为人忠厚老实，认为孺子可教。从第二年起，道长便带他上山采药，并照顾诊务，开始让父亲学习经典医籍，并临床抄方见习。父亲每日清晨寅时起床，随道长习武练功。宋老道长传授八卦、太极剑、以及罗汉拳、少林拳等，并传授气功要领。第三年，道长正式向父亲传授内、外、妇、针灸科等医学，并把他多年的临床经验和学说思想传给父亲，同时给予试诊，实习临床诊治。我父亲原来就有一定的医学、古文基础，再经过这样三年的刻苦学习，医学水平大有长进，并学会了一些武功。在学习期满临别下山之时，宋老道长还将他一生的医学结晶——《宋氏医学真传》（手抄本）一书赠送给了父亲。

父亲22岁时，到南京下江考棚张雨生堂叔父医寓襄诊，进一步实践所学。堂叔外出时父亲代为应诊，因为疗效卓著而深受病员的好评。

下江考棚地处南门，父亲经常约些好友到雨花台游玩。一天，父亲和好友在雨花台游玩时，突然遇到了四个小无赖，向他们勒索钱财，父亲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凭着在茅山学到的一些武功，狠狠地教训了这四个小无赖。自此以后，这些无赖遇到我父亲，就不敢再寻事生非了。

两年后，张雨生去世。父亲即离开医寓，来到南京土街口正春和药店坐堂行医。当时正值中医师资格考试，由当时南京市市长石璜主持，前清御医黄桐甲主考。试题是《内经》经文论述：1.“上古治未病不治已病说”；2.“有故无

殒亦无殒也”；3.“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父亲参加考试的答卷，主考看后，甚为满意，认为立论分析正确。又复面试，问保元汤的出处及如何应用，因父亲自幼勤奋好学，博览典籍而对答如流。因此，父亲在这次国民政府举办的第一届国医考试中名列榜首。

父亲坐堂行医之初，因其年轻，加上名气未显，业务不甚好，当时行话叫做坐“冷板凳”。父亲为此便发愤学习，博览群书，悟其深奥之精华。随着医术的不断提高，业务也逐渐好转，渐渐地能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了。1930年春，有一天，父亲在药店大门外遇到一个病妇，正在痛苦地呻吟着，由两人抬着经过药店门口，即上前问其病因，得知是产妇难产。当时没有妇产医院，加上老百姓又没有钱，一般医院见状都拒诊不收，只有抬回去等死。父亲看到这种情况，随即施行针灸之术，如针合谷、三阴交、至阳、太冲等穴，针后产妇平安分娩，小孩顺产，家属感激不尽。1933年夏天，父亲正在马路上行走，突然见一老人中暑昏倒，父亲马上叫人赶快把老人抬到阴凉处，针、药并施，使老人慢慢苏醒过来，挽回了生命。由于这两次抢救成功，父亲的名声便传开了，业务也就逐渐好起来了。

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蒋介石、汪精卫之流崇洋媚外，否定祖国传统医学，竟然发出取缔中医之禁令，引起了全国中医界的极大愤慨。父亲与在南京的中医同仁张简斋、随翰英诸老先生组织了游行请愿，反对取缔中医。在全国各地中医界人士的一片抗议声中，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取消禁令，又恢复了中医的合法地位。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南

京沦陷前夕，江宁县禄口镇被炸，祖父开的“寿春堂”小药店也被烧成一片废墟。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和祖父不得不带着全家十数口人忍痛离开南京，向南乡、高淳、句容、石臼湖一带逃难。一路走，一路行医治病，换些粮食供一家人糊口。这样，父亲和祖父就成了走乡串镇的走访郎中了。在逃难的路上，全家十数口人，老的六、七十岁，小的才二、三岁，老弱妇幼者多，青壮年少者少，行动很不方便，真是流离颠沛，受尽了苦楚。

后来逃到靠近石臼湖的沙垾地区，这里是水网地带，只有靠船才能活动，所以比较安全。我们全家就在此地一个叫“陡盖”的小村庄落户下来。面对日本侵略者的骚扰，当地农民自发地武装起来抗击日本鬼子。日本兵大队来时，农民们早已乘上小船躲到芦苇丛中去了。日本兵晚上又不敢留在村上，怕遭袭击；小股日本兵来就被消灭掉了。

父亲和祖父就在这一带挂牌行医。当地有一位姓张的大刀会首领，是组织村民抗日的负责人。他的儿子生了很重的伤寒病，父亲把他儿子的病治好了。他一定要叫他儿子张传福拜我父亲作干爹。

这位姓张的大刀会首领打仗很勇敢，但很迷信，自称刀枪不入。有一次，日本鬼子和伪军下乡扫荡，他骑了缴获的日本洋马，冲锋在前，和日本兵拚杀，被伪军在背后放了冷枪而英勇牺牲了，他手下的大刀会员也被打散了。后来，共产党把打散的会员召集起来，组织训练加入了游击队，成为打击日寇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在这期间，父亲因医术高明，在当地群众中名气很大，不论大人还是孩童，有病都纷纷请我父亲医治。新四军游击队也很相信我父亲，有什么病

也都找我父亲诊治。由于相处日久，感情很好，父亲就成了他们的编外“军医”，悉心为战士们治伤看病。我、姐姐和农村小朋友玩得很痛快，白天下河摸鱼捉虾，采莲挖藕；晚上在月光下，游击队员们还经常教孩子们唱抗日歌曲。当时的游击队长赵家淦同志和我父亲相处最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一直到解放以后还保持密切的联系。而我们一家在新四军游击队保护的村子里生活，既安全又快乐。现在回想起当时的生活，还觉得很有意思。

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后，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全城一片焦土。一年后，汉奸汪精卫出来组建伪政府，要逃难的人们回南京。当时，因我家老小十几口人不能长期住在外地他乡，又没有力量逃到重庆去，只好又回到南京。父亲就在明瓦廊租了一处房子行医开业。然而亡国奴的生活实在不好过，出入城门要搜身检查，妇女倍受污辱，还要向日本兵行礼鞠躬，稍不如意，就遭拳打脚踢。

由于南京大屠杀后，环境污染，卫生极差，传染病流行。先是伤寒，继而霍乱、肝炎、恶性疟疾、流脑、乙脑等等，不断发生。当时医院少，医药条件差，日伪政府更谈不上防疫工作，贫病交加的老百姓只好在水深火热中挣扎。作为医生的父亲目睹此情此景，甚感悲伤，但又无可奈何，只能以自己的一技之长为群众解除一些病痛。因此，他从回到南京后，夜以继日不辞辛劳地为病人治病。有时日伪汉奸、奸商们找他治病，父亲就多要些钱，拿这些钱买来药品免费为贫苦老百姓送医送药。记得1941年春，有一老妪搀扶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孙子前来父亲诊所求医，说：“我一家只有我和孙子两人了。孙子的父母被日本兵枪杀了。每天靠拣破

烂为生，难以维持生活。如今孙子病了，不吃不喝，发热不退，已拖延了十来天了。实在无法，只好求求先生了。”父亲见孩子骨瘦如柴，经诊断是伤寒病，便不收诊费给开了处方。但是，一连三天她也没带孙子来复诊，父亲很是着急，说：“这种病是不能耽误的，否则预后不好。”这天父亲在街上碰见了老奴，问她：“为什么不带孙子来复诊呢？”老奴说：“先生的好心我是知道的，虽然先生不收我诊费，但我抓药还是要付钱的，我哪有钱来买药呢？所以我没法再到您诊所复诊，现在孙子卧床不起，只有等死了。”父亲说：

“快带我到你家去。”至其家，诊视后，当即重新开了一张处方，叫老奴到中央商场王太和堂拿药，并对老奴说：“我已签字说明钱记在我帐上，你不用付药费，只管拿走。”父亲临出她家门时，还送给老奴二十块洋钱，暂作她孙子的调养费用。以后每隔两、三天都要去她家一趟，一直到小孩子病好。祖孙二人非常感激父亲的救命之恩。父亲告诫我们说：“做医生不能见死不救，只要是力所能及，就应该尽力相助。治病救人要认真彻底，不可半途而废，所以治疗要坚持到治愈才能放手，否则徒劳无功。这是作医生起码的医德医风，你们行医在言行作风上也应该这样做，不要作辜负人民的事。”

由于治好了许多传染病和疑难杂症，因而深得社会各界的尊敬。从此，父亲的声誉日隆，求医者日多，纷纷送来了匾额、锦旗、银盾和银塔，以赞扬父亲的医德、医风。记得匾额上写的是“家学渊源”、“妙手回春”、“扁鹊再世”、“华佗再世”、“扁鹊重生”等语。其中有一匾额用金字写了“仲圣宗风”四个大字，并在前面写了一段铭文：“仲

梁先生良医也。幼承庭训，其先德以医名于世者，凡七世。远稽华胄，仲景为方书之祖，洁古诀内经之微，又有子和景岳诸人，各有阐发渊源，家学至先生集其大成。于其着手成春，活人无算，政民等身受其惠，爰为榜书，以扬仁风云”。加上父亲受祖父的影响，认为人多做好事善事将来会有好报的，所以他在每年夏天都坚持烧茶水放在路边，免费给行人解渴，并在桌上放些仁丹、午时茶、避瘟丹、十滴水等药物供行人取用，以防中暑；冬天则烧几桶热粥，捐些棉衣，帮助贫苦百姓度过饥寒。

在日伪统治时期，医生挂牌行医也是很不容易的。我记得汪伪汉奸李士群在南京伪警备司令部任职时，他的女儿患了天花病，找我父亲去诊治。这种天花，须要透发病毒才能有效，否则病毒内攻，有生命危险。经过开方治疗，三天后，该女头面肿大，天花化脓。李士群当即叫去父亲，面有怒色地问：“是否下错了药？”父亲解释说：“这是病情好转的征兆，是可以治愈的。”李士群将信将疑，竟将父亲扣作人质为其女诊治。经过父亲十天的悉心治疗，该女热退肿消，天花结痂而愈，李才放父亲回家。否则必招来杀身之祸。

虽然我全家离开沙埕地区回到了南京，但父亲仍然暗地里和结识的南乡新四军保持联系。赵家淦队长，经常派人以治病为名来到南京，不时给我父亲带来游击队新四军胜利的消息，向我父亲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在我父亲诊所落脚，以病员身份住下来，侦察日伪敌情。1942年秋，记得有一天，来了两位新四军同志，一位年稍长的，叫周老大，一位年轻的叫小熊，住在诊所里。突然夜间有人紧急敲门，开门后闯

进了一队日本宪兵和一个翻译，不问三七二十一地到处乱翻，所幸没有翻到任何证据，最后把两位新四军带走了。听说这两位新四军很坚强，虽然遭受酷刑，也没有招供。父亲就四处奔走营救，找人疏通翻译，送上两枚金戒指作为见面礼，后又送去二根金条，才将两位新四军释放出来。

抗战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父亲和全国人民一样，感到欢欣鼓舞，认为老百姓从此能过上好日子了。但蒋介石还都南京后的所做所为，使老百姓很失望。当时物价一日数涨，民不聊生。国民党政府想的是如何发动内战，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更谈不上卫生保健防疫工作了。父亲为之感到痛心。南京是国民党的首都，军政官员经常来找我父亲治病，有些官僚架子很大，淫威十足，对我父亲呼来唤去，把医生看成是他们的奴才。但也有些老革命党人，还是很有礼仪的，待人也很谦和。记得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经常请我父亲治病，经过较长时间接触相处，建立了友谊。于右任为了感谢我父亲治愈疾病的情谊，曾亲自写了四幅条幅相送。内容大意是：“东南元气赖公存，掷笔青宵道已尊；一代文章推老辈，竹林排日集群峰；湖海论交晚得君，千秋史悉叙平分；夕阳欲卷中原去，一滴横秋遏暮云；倚马千言笔未停，酒酣起舞剑光青。驰骋沙场烽火浓，草罢军书夜枕戈；昨借史迁游侠传，十千买醉不辞多；……”当时国民党参谋次长林蔚家中老小也经常找我父亲去治病，都治好了。所以林蔚对我父亲的医术非常相信。有一次蒋介石生病，林蔚就推荐我父亲的医道高明。蒋即邀请我父亲去为他诊治了数次。在我祖父82岁去世时，蒋介石曾派人将亲笔书写的挽词送来，上写“倬云先生千古”，中写“奠”字，下写“蒋中正敬

挽”。文革期间，为此事我父亲还受到了指责。

国民党政府从不关心人民的痛苦和身体健康，更谈不上提倡发展中医事业，任其自生自灭。当时中医界前辈感到中医事业后继乏人的现象相当严重，必须迅速培养人才，才能使祖国的传统医学得到发展。南京几位名老中医如张简斋、随翰英、汪绍生、郭受天和我父亲等人遂联名发起恢复和成立“南京国医传习所”。集资办学，培养中医人材。现在南京中医界起承上启下作用的骨干力量，均是这所学校毕业的学生。

国民党政治腐败，民不聊生。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失败，加速了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垮台。国民党政府在逃离南京之前，在人民群众中大肆进行恐怖宣传，说共产党共产共妻、杀人放火等等。煽动人民群众害怕共产党，跟国民党走。也有国民党官员要我父亲早点出走。由于父亲在汪伪和蒋帮统治时期一直与共产党新四军有较密切的交往，所以对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有所认识，了解党对知识分子的一贯保护政策，思想上根本不听反动派的谣言，仍是安心行医，迎接解放，决定留下来不走，为新中国服务。

南京解放后，各行各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兴旺气象。父亲也象多年饱经风霜的枯树一样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本来从来不问政治，专搞业务的父亲解放后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愿为“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先后担任了南京市第一届中医学会主任委员、省中医学会副理事长，并当选为江苏省政协委员、南京市人民代表、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局副局长等

职。1956年全国各行各业公私合营走集体化道路，中医界也不例外。父亲带头放弃个人开业的优厚收入，毅然率领儿女走向公职。同时，又积极筹备组建南京市第一所中医医院，并兼任院长一职，为中医院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一份贡献。

南京市中医院成立后，父亲积极推进各项工作，大力培养中医人材，努力发展中医事业。除了认真搞好医院各项业务外，又亲临第一线为病员服务。不论是门诊还是在病房，都能认真指导年青医师，传授临床经验，并按照毛泽东同志“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方针，组织医务人员反复学习了《实践论》。在我父亲悉心指导下，由年青医师濮青宇、陈寿春、张晓初、胡修贞等人撰写了《治疗212例麻疹临床观察总结》，由张晓初撰写了《中西医合作治愈二例严重败血症的临床体验》等论著，这是本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不断总结临床经验，使之由感性认识不断上升为理性认识的实例。我父亲同时积极参加学术研究活动，多次发表学术报告，广泛进行交流，有的已作为资料，汇编成册，并参与科研工作，撰写多篇论文。于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间所发表的文章较多，如：《哮喘论治》、《败血症治疗经验介绍》、《崩漏症治验》、《麻疹病论述》、《肝病治疗规律》、《肝硬化腹水论治探讨》、《冠心病演变初探》、《雷诺氏病治疗》、《席汉氏综合征治疗》、《痹证辨证论治》等篇。已分别发表在《中华医学学报》、《中医杂志》和《江苏中医》月刊上，丰富了祖国的医学宝库。

在教学方面，开办了南京市中医专科学校，亲自教学并兼任校长，共培养出两批学员，还连续开办三期中医学徒

班，以继承名老中医的临床经验。这些学员、学徒现大部分已晋升为中、高级职称的医师，成为南京市中医界的骨干。又协助卫生部在南京先后开办三期高级西医学习中医班，成立讲师团，系统传授中医知识。学员通过学习，具有理论和实践的较深知识，本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目的，写出了如张晓初的《50例沙门氏菌属感染（湿温病）临床观察体验》和蒋冠英、戚景如的《中医治疗乳糜尿50例的初步分析》等多篇高质量论文，多数获得优秀论文奖，受到卫生部的嘉奖。这些学员现在大部分在中医研究院或各省中医研究所承担主要业务工作，大多数评上了高级职称，现正发挥中西医结合研究的优势，取得了不少具有国际水平的成果。

父亲治学态度严谨，教学认真，一丝不苟，做到诲人不倦。对子女、学生一言一行，严格要求。如子女、学生写抄病历、处方，写错一个字也不放过。父亲经常讲：“病员找我们看病是对医生的最大信任和寄予最大的希望，是把生命交给我们，如果我们对病员不负责任，怎能对得起病人的信任和自己的良知呢？医生和病员的关系是鱼和水的关系，一个医生如果离开了病人，就等于鱼离开了水，就会一事无成，更谈不上医学上的长进，所以，我们要认真负责、谨慎的为病员服务，这是医生的天职。”

父亲自从担任行政领导和教学工作后，非常繁忙，但是他从不失信于病人，每星期规定的门诊、查房都亲自按时诊视，从不无故缺席。有时有特殊任务要办，也要事先和病员打招呼，不使病人失望。他常说：“一位病员要找哪位医生，看病之前已在家中盘算好了，有的从远道专程而来，如果使病人失望，做医生的内心要受到谴责的。”由此可见父

亲医德医风之高尚。

父亲的医学理论造诣很深，临床经验丰富，对古人的学术经验，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古人的医学理论，能取长补短，融会贯通，创造性地发挥学理。如对经典著作、内经、本草钻研精深，对伤寒论、温病学术，以往有经方派、时方派之争，父亲认为各有长短，各有片面性，而采用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认识。如伤寒着重顾正气（阳气）而温床强调保护津液（阴液），两者能灵活应用，互为补短，则对表证热性病变的治疗有很大意义。对金元四大家的学说，也同样不能偏执一家而废弃另一家，应该全面衡量，统筹兼顾，做到灵活应用，因证论治，才能对治疗慢性疾病有裨益。如以朱丹溪的滋阴和李东垣的重脾胃为例，滋阴不宜太腻而有碍脾胃功能，助脾胃也不宜过分温燥，过分温燥，则易耗津液，故而用药不能偏执，以防顾此失彼之虞。父亲为阐明自己在医学理论研究和临床经验方面独到见解的著有《仲梁氏医话医案选》一书传之后世。

在妇科方面，父亲对经、带、胎、产四大症也有较深的研究，特别是对妇科崩漏之症和妇科不孕症有独到治疗方法，疗效显著。为推广妇科临床经验，父亲著有《女科集锦》一书，已出版。

在儿科方面，祖传《痧症秘诀》对父亲启发很大，故对痧、痘、惊、疳四大症有很深的了解，对“痧痘”之症能得心应手的治疗，对小儿“疳积”一症亦有独到的见解和治疗方法。首创的“康复肥儿散”一方，在临床上对小儿疳积确有疗效。其临床经验和验方介绍，已被后人整理成文在刊物上发表，有张晓初写的《小儿“疳症”的证治（附验方）》等文。

父亲希望在有生之年将他数十年的临床经验和理论研究继续整理出来，著书立说传给后人，为祖国医学的发展做点贡献。然而就在资料准备就绪，正要着手撰写的时候，灾难深重的“文化大革命”到来了，再没有时间容许他安安静静地著书立说了。当时的造反派说我父亲是牛鬼蛇神、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三开”分子，是当权派、走资派，是斗争的对象。在林彪、“四人帮”耀武扬威、横行霸道的日子里，我和姐姐，还有父亲的学生统统被下放到农村劳动。1971年5月，父亲因长期被批斗，身边无人照顾，忧郁成疾，突发高血压脑溢血而病故。其时，我们均不在父亲身边。火化后，因是“反革命分子”，不准入土，骨灰只好寄放在火葬场内。

粉碎“四人帮”后，党和人民政府为我父亲平反昭雪，开了隆重的追悼会。江苏省委副书记彭冲、许家屯，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政委钟期光、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宋时轮等领导人送了花圈，发了唁电。南京市委宣传部长朱启銓同志亲自致悼词，对我父亲的一生评价很高。追悼会后，父亲的骨灰安葬在黄金山公墓里。

党和人民政府还给我和姐姐以及父亲的学生落实政策，调回南京，现在工作得都很好。为了感谢党的恩情，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为整理祖国医学遗产，为继承先父的遗志而不懈努力。

目前，我和我父亲的几位学生都已成为中医界有一定影响的人才，均获高级医师职称，正着手准备把我父亲的遗稿整理成书发表，以完成我父亲的遗愿。

* 张仲梁先生是本文作者的父亲。本文作者现为南京铁道医学院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南京市鼓楼区政协副主席。

南京师范大学附中简史

吕鸣亚

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前身是1902年张之洞奏设的三江师范学堂附属学校。1905年两江总督周馥奏准改称两江师范学堂附属学校。校址在北极阁下六朝松前（即现在的南京东南大学内）。武昌起义后因战事停办。1915年于两江师范原址改办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于1917年9月创办附属中学。1921年6月，南高师附中又同时隶属于东南大学。1923年正式易名为东南大学附属中学。

南高师附中、东大附中不仅以教学质量优良著称，而且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从“五四”运动到“五卅”运动这一时期，附中学生开始有了民族危机感和反帝反封建的觉醒。1923年，校内就有共青团组织活动。1925年三、四月间，共产党的领导人恽代英、肖楚女到校作了近十次讲演，撒下了革命的种子。在“五卅”运动的第二天，东大附中学生即在南京组织了示威游行，并且深入到下关英国资本家办的和记洋行发动工人罢工。

南高师附中及后来的东大附中都是隶属于大学的一部分，不是独立的学校，校址亦附设在大学部内，所以有机会参加大学部的许多活动。如聆听杜威、罗素、泰戈尔、马相伯、梁启超、胡适等著名学者的讲演。这对于陶冶情操，激

发求知欲望，开阔眼界都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其间主持附中工作的负责人称主任，由大学部委派名教授担任。其中在任最久的为廖世承先生（1920——1927）。廖先生与舒新城等人一起积极从事教育科学实验，试行道尔顿制。在学制改革中，独树一帜，率先采用“六、三、三”（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新学制。《东大附中道尔顿制实验报告》、《施行新学制后之东大附中》等书就是他们共同实验研究的成果。我国的中等教育实验即肇始于此。廖先生任职期间对于教育科研、学制改革均有所建树，功绩斐然，声誉卓著，影响深远。解放后廖先生任上海师范学院院长，1970年去世。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成立国立中央大学，原东大附中更名国立中央大学实验学校。此时的中大实校从幼稚园而小学，而初中，而高中，成为我国普通教育等级最完备的一所实验学校。

从南高师附中、东大附中到中大实校，均享有很高的声誉，素以治学严谨、校风学风良好、教学质量高著称，当时数理化教材都采用国外的原文版。国文教材是自己编印的。同时开设选修课，出版杂志《实验教育》。学校一贯慎聘良师，如著名物理学家、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严济慈等，都是深受学生尊敬的教师。在学校的严格教育下，在革命斗争的锻炼中，学生中涌现出一批中华民族的精英。如无产阶级革命家、1931年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顾作霖烈士、英勇就义的顾衡烈士、杨超烈士，当代文学大师巴金，革命文艺战士、著名文艺理论家胡风等。

中大实校十分重视级任导师的工作，班级以导师的名字

命名，如（严）蕖裳级，（朱）浩然级，（常）任侠级，（黄）国华级。直到现在，这些年逾古稀的老校友仍十分怀念他们的导师和班集体。

抗战开始，中大实校迁校后方，一年之中经历了一迁屯溪，再迁长沙，三迁贵阳的艰苦历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风云突变，南京已处于敌机狂轰滥炸的威胁之下。于是，在八月间，许恪士主任毅然决定，由常任侠、薛人仰等十位老师带领无家可归、留在学校的近二百名学生徒步西迁，到安徽屯溪上课两月。十一月份，形势更加危急，学校从屯溪向长沙转移。这群流亡学生象被遗弃的孤儿，惶惶不可终日，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常任侠老师挺身而出，侠义自任。这批流亡学生在行进途中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常老师还请来张曙、刘良模教唱抗战歌曲，组成歌咏队参加街头、舞台各种义演，举办《抗日战报》义卖，义务推销，捐款支前，慰问伤兵，救济难民，在抗日救亡中接触社会，经风雨见世面，增长才干。

1938年冬，湘粤告急，乃三迁黔中，建新校址于贵阳南门马鞍山下，南明河畔。1943年添设两个师范班。

1941年秋，贵阳中央大学实验学校因大学部远在重庆沙坪坝，不相隶属，与创设初旨不符，决定与重庆青木关国立第十四中学互易校名。故青木关十四中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附中，而贵阳中大实中则改称国立第十四中学。当时仅有少数学生转往重庆青木关，所以贵阳国立十四中仍保持着原来中大实校的面貌。1942年春，为解决中大教职工子女就近上学问题，大学部又在沙坪坝增设中央大学附中分校。为进行教育心理实验的需要，同时又添设中央大学研究教育心理学

部中学六年制学习心理实验班，由著名教育心理学家艾伟教授主持。著名词学大师唐圭璋教授，著名美学家、诗人常任侠教授都曾在这个班任教。

在抗日战争期间，贵阳、青木关和沙坪坝三地的附中学生生活都十分艰苦，吃的是霉米饭，穿的是平价布，点的是桐油灯。贵阳的同学入学时每人要验交锄头一把，种地一块。但是学生们为肩负天下兴亡的责任而努力学习，仍然继承着实校时代的传统，教学要求也不减当年。数、理、化教材仍采用外国原文版，英语教学聘有外籍教师。教育是多样化，除常规的课堂教育外，还举行专题讨论，教育学生全面发展。为了培养学生各方面的学习能力，学校经常开展许多课外活动，如讲演比赛，歌咏比赛、英语讲演比赛、图画比赛，各种球类比赛，此外还组织抗日爱国的话剧演出，壁报亦如雨后春笋。在这一时期曾在贵阳、青木关、沙坪坝三处任校长的有杨希震、章祖愈、赵廷为、郑大源、熊子容、周明颐、王希成、魏绍舜等。在八年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学校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人才。据1988年不完全统计，任教授的115名，研究员27名，高级工程师111名，获其它高级职称的117名。担任高级领导职务的约30名。

国立中央大学实验学校内迁后，南京汪伪国民政府又于朝天宫另立中央大学附属实验中学，1945年抗战胜利后解散。

贵阳十四中、青木关中大附中和沙坪坝附中分校三处师生，于1946年一道迁回南京，合并为一个学校，定名国立中央大学附属中学。当年8月21日，首批师生到达三牌楼察哈尔路新校址——即旧农学院地址，占地一百余亩。彭百川任